

2007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新

湖南文学史稿

胡良桂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立项资助出版

新
湖南文学
史稿

胡良桂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湖南文学史稿 / 胡良桂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438 - 5128 - 3

I. 新... II. 胡... III. 文学史 - 中国 - 1949 ~ 1976
IV. I20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0789 号

新湖南文学史稿

作 者: 胡良桂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穆陵宁

装 帧 设 计: 黄 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富洲印刷厂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11

字 数: 27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128 - 3

定 价: 25.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湖南人民出版社



概 说

湖南的当代文学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当代文学一样，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现代文学发端于1919年五四运动，它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吸取了世界进步与革命文学的营养，是以逐步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流的多元格局的新文学。在30年间，它作为整个中国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在战斗中培育和锤炼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传统。湖南当代文学就是赓续着这个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下曲折地成长与壮大起来的。

早在30年代，鲁迅曾经预言：“惟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①事实正如鲁迅所料，在五四时期开始萌芽的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正因如此，反革命的压迫也就接踵而至，特别在十年内战时期，这种压迫曾经达到了高潮。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谱写下了它光荣的第一页，而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则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到了

^① 鲁迅：《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8页。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成就和教训，提出了在我国情况下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理论纲领。在《讲话》的鼓舞和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致力于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并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民文艺，从而把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雏形，也为湖南当代文学的崛起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新湖南文学，从时间概念上说，是指新中国17年、“文革”10年（1949—1976）中国这一时期的湖南文学创作。从地域作家的概念上说，包括湘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和非湘籍作家在湖南本土上的文学创作：湘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又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湖南本土作家在湖南创作的作品，如周立波、蒋牧良、康濯、柯蓝、刘勇、谢璞、未央、孙健忠等；二、湘籍作家在湖南本土之外创作的作品，如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彭德怀、萧克、周扬、田汉、张天翼、杨沫、廖沫沙、朱子奇、汪承栋、刘永济、程千帆、刘大杰等；三、湘籍作家在台湾创作的作品，如洛夫、向明、琼瑶、钱歌川等。非湘籍作家在湖南本土的文学创作，如张行、彭燕郊、任光椿、叶蔚林等。以上的文学创作或时间上或空间上都与湖南有密切关系，故称新湖南文学。

既然新湖南文学史是以毛泽东时代为主，时间段理应在1949—1976年。但是，这批作家中的年长者在“新中国”之前已开始创作，而其年轻者则在此后又活动了相当一段时间，所以新湖南文学除了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28年之外，往往须推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讲话》成了新文学创作的指南，也开辟了湖南文学的新阶段——剧烈的社会变动和土风变迁使文学创作明显地变换了色彩；往下大



体应延伸到新的历史时期，一般均以 1980 年代为下限，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是时代思潮，导致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坛面貌大不相同。因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鉴于这是一部断代史，所涉作家当在这一时期内公开出版过一部以上著作（旧体诗词作家除外）。只要在此期间出版过著作，此前或此后的创作，都可根据其价值定位视为一个整体。凡未在此期间出版过著作的，本书不作评述。

1949—1976 年，新湖南文学大致分为两个时期。

从湖南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 17 年为第一时期（1949—1966 年）；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为第二时期（1966—1976 年）。

这 27 年中，湖南当代文学走过一段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道路，形成了湖南文学史上一个“爬坡”、“滑坡”态势。这样来描述湖南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正是随物赋形、因势成文，是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自然，正如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绝对事物一样，这样的分期，也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也许会出现年代更长的分期方法，但无论如何，由于这个分期方法比较强调了事物的质变点，就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它的显示阶段的那些特征，也还是不会消失的。

第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总的说是繁荣的，有生气的，在各种文艺形式中，都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其中，如《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杨沫）这样的长篇小说，就是比起“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优秀长篇作品，也是毫不逊色的，而且直到今天，它们不仅代表着湖南，也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平。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刘雨生、陈先晋、邓秀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等，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在他们身上，分别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极为深广的社会内容。通过他们，不仅可以看到中



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英雄气质，而且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这些具有独特性格内容和鲜明个性特征的典型形象，丰富了中外文学的人物画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典型形象的出现，是对世界进步文学的一个崭新贡献。此外，塑造了这些典型形象的作品，在语言、结构和艺术手法等方面，也在学习传统和借鉴外来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创造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独特的民族形式。这些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赢得了世界各地中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高度评价，为新中国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毛泽东诗词是湖南，更是中华民族极为宝贵的文学遗产。这里有空前的人民觉醒，有深沉的历史思索，有壮烈的血与火的斗争，有暂时的挫折和迂回，也有波澜壮阔的进军和改天换地的胜利。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毛泽东诗词，跳动着时代精神的脉搏，激荡着时代感情的潮汐，是时代的歌声。它深深地植根于具有诗歌传统的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毛泽东是湖湘文化滋润、培育出来的人杰，他以自己所投身的伟大事业的经历和长期的艺术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未央的“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我看你正在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使我们看到，他作为志愿军战士的一员，正在“鲜血浴着弹片”的坑道里，“驰过战火燃烧的村庄”，唱出了许多动人的歌，表达了对祖国的爱和怀念，对战友的无限深情，对保卫和平的决心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多种感情的交织，像火一样燃烧着我们的胸膛。

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和《毛泽东诗词》、《祖国，我回来了》为代表的一批作品的出现，是湖南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收获。这个收获的季节，恰恰是在湖南解放后的第一个10年。“十年树人”，在文学创作上，10年也是可以构成一个周期的。如果我们很好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和



宝贵时间，完全可以希望争取到第二个收获季节的，那时，我们湖南当代文学的面貌也许将是另外一番光景。但是，很可惜，在第一个 10 年的末期，“左”的思潮逐渐泛滥起来，并愈演愈烈，文艺理论上的清规戒律也越来越多，破坏了“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影响所及，使一大批已成熟的作家和后起之秀不能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作家和艺术家们不可能充分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才能，譬如一粒种子，落在冰冷的土地上，即令扼杀不了它的生机，至少也会推迟它的收获季节的到来。针对当时全国出现的类似情况，周恩来同志 1961 年 6 月 19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发展，本来有可能打破沉闷的空气，造成文艺繁荣的新局面，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讲话并没有得到宣传和贯彻，因而在接踵而来的那段时间里，根深蒂固的“左”的倾向又有了发展，加上封建主义的残余，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精神桎梏，大大地妨碍了以高度的独创性为特色的文学艺术的发展。

在第二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的一部分权力，使我们的文坛，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形成了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局面。作家和人民被剥夺了言论、创作出版和自由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的权利。在这 27 年的湖南当代文学史上，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内，湖南基本上有三类状态的文艺：一、被动的阴谋文艺；二、“瞒和骗”的文艺；三、革命文艺。第一种虽然也是瞒和骗的文艺，但它是被动地成为阴谋家的工具的，第二种虽然不同于第一种，但它在客观上是为“四人帮”点缀文坛的，因此，这两种“文艺”在当时都可以受到保护。至于第三种，虽然也有，但数量是不多的。如短篇小说《山鹰展翅》（孙健忠）、散文《珍珠赋》（谢璞）、湘剧《园丁之歌》（柳仲甫执笔）。其中有



些作品甚至被迫转入地下，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重见天日，如《第二次握手》（张扬）。这个时期，可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文艺评论，没有百花齐放。在这个时期，湖南被动的“阴谋文艺”倒是很值得注意研究的一种现象。就是说，湖南作家并没有得到“四人帮”亲自授意和指挥，而是受到那种政治气候与环境的影响，写了一些歌颂所谓“文革”所谓的新生事物的作品。剖析这种现象，引出必要的见识和教训，是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个时期的历史还证明，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革命文学的道路也是这样。在30年代曾经遭受国民党法西斯“围剿”的革命文学，在60年代到70年代，又一次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式的摧残。这种历史的“酷似”不是偶然的。这两种压迫的背景虽然不同（一次发生在人民没有权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却是发生在被林彪、“四人帮”暂时篡夺了部分权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却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和阶级的原因，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目录

概说

第一章 新时代与“十七年”的湖南文学

- | | |
|-----------------------|-----|
| 第一节 制度变革中的文学蜕变 | (1) |
| 第二节 “十七年”湖南文学掠影 | (7) |
-

第二章 湖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 | | |
|----------------------------|------|
| 第一节 周立波建国后创作的发展 | (20) |
| 第二节 《山乡巨变》：秀丽清新的南国画卷 | (27) |
-

第三章 从抗争走向革命

- | | |
|-----------------------|------|
| 第一节 杨沫的生活与创作道路 | (34) |
| 第二节 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 (43) |



第四章 卓越的人民戏剧家

- 第一节 田汉戏剧创作的新阶段 (52)
第二节 《关汉卿》：响当当的铜豌豆 (59)
第三节 新编历史剧《谢瑶环》 (65)
-

第五章 诗词大国推盟主

- 第一节 毛泽东诗词的思想与艺术 (72)
第二节 现代旧体咏物诗《沁园春·雪》 (89)
第三节 《卜算子·咏梅》：新时代的红梅颂 (98)
-

第六章 一个时代文艺思想的阐释者

- 第一节 周扬的文艺思想及其时代特征 (107)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多维结构 (115)
第三节 历史责任与偏向矫正 (127)
-

第七章 新生活的歌者

- 第一节 《水滴石穿》：敏锐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 (138)
第二节 小说的耕耘者与散文诗的开垦者 (144)
第三节 《六十年的变迁》：回首历史话沧桑 (151)
第四节 幽默与辛辣兼具的讽刺艺术 (158)
第五节 深情地吟唱普通劳动者 (167)
第六节 《石子小粒粒》与《武陵山下》 (175)



第八章 各领风骚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

第一节 回响着劳动与斗争的旋律	(184)
第二节 内与外、常与变的艺术展示	(192)
第三节 思想风采与山川情怀	(210)
第四节 意味深长的改编剧目与情趣盎然的地方小戏.....	
	(219)

第九章 千姿百态的文学批评与旧体诗词

第一节 诗词的豪放与学者的睿智	(228)
第二节 在鲁迅研究与“花边文学”之间	(237)
第三节 戎马倥偬的挥就诗篇	(246)
第四节 精雕细凿的华美词章	(254)

第十章 推陈出新的国学通才

第一节 通识与创新兼善的国学宗师	(266)
第二节 诗学与文献学的双向建构	(280)
第三节 一部名著三次修订的历史尴尬	(293)
第四节 千年赋史的拓荒者	(306)

第十一章 歧途与抗争：“文革”中的文学

第一节 “文学”的时代病	(317)
第二节 艰苦顽强的文学抗争	(323)



第三节 《园丁之歌》：低气压下绽出的新蕾 (330)

后 记



第一章 新时代与“十七年”的湖南文学

第一节 制度变革中的文学蜕变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开启了湖南历史的新阶段，也开启了湖南文学的新阶段。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湖南的南下工作队文工团，为湖南人民带来了解放区的革命文艺。接着，一批湘籍作家又回到湖南，带回了他们创造的新成果。这两支队伍在三湘大地的聚合，就形成了湖南文艺界空前团结的盛大场面。他们带着革命文学的宝贵传统，进入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始了新的战斗里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证明，凡属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变革，总是要反映到文学上，引起文学性质的变化。这一事实，证明了鲁迅说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光辉论点。^①文学属于上层建筑，是在观念形态上，通过自己的特殊手段反映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变了，文学就会跟着发生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我国革命文学的整个性质还

^① 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当然也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那时文学作品所反映的主要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或者说，作家们是以自己熟悉的各种题材和形式，为这一斗争服务。那时，社会主义还没有付诸实践，只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因此，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学的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已经不只是一种思想体系或一种理想，而是逐步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了。通过形象化的手段，反映并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巩固，是我国当代文学的光荣使命。当我们的文学真正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并真正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广大劳动者（包括脑力劳动者）所掌握的时候，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了。由于制度变革的需要，湖南省于1950年7月10日成立了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委会，筹委会主任谭丕模，副主任王希彦。1953年11月，召开了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主任委员魏猛克，副主任委员宋扬。稍后又组建了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具体负责组织、规划湖南省的文学创作，培养湖南的文学新人。1958年5月、1962年11月分别召开了湖南省第二、第三次文代会，均由周立波任主席。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杂志《湖南文学》、《群众文艺》，《湖南日报》开设了文艺副刊，这些报刊虽几经风霜，但始终以繁荣湖南文学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为推动和促进湖南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无疑是社会制度的变革催发了文学的蜕变。

从总体上说，这种制度的变革使湖南当代文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在湖南解放的最初年代，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解放了



文艺生产力，劳动人民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物质生活的初步改善和提高，为他们积极学习文化、开展文艺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同时，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广大作家的生活条件、学习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普遍的改善，这样，就从物质上造成了文学发展的广大“市场”，无论是创作队伍还是读者队伍都是新中国成立前无法比拟的。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可歌可泣的奋斗历史，给湖南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第一次提供了表现这些题材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出现阻力和困难，但是，植根于劳动人民生活土壤中的这一崭新的文学是不可摧毁的，它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于下列诸方面，并构成了湖南当代文学的鲜明特色。

社会主义时期绚烂壮丽的生活、艰难曲折的斗争是湖南当代文学发育、成长的肥沃土壤。湖南解放以来，湖南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生活和斗争及其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中的社会，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困难和曲折，痛苦和失败，有时甚至充满惊涛骇浪。忠实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湖南当代文学，获得了重要的突破。作家和工农兵群众进一步结合，文学创作和劳动人民进一步结合，成了文学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① 在湖南，在正常的条件下，艺术和人民的关系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造成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即使在非正常的条件下，甚至在林彪、“四人帮”的摧残下依然生生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湖南当代文学在和人民的紧密联系中汲取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不少作者，即使在“四人帮”统治时期都没有中断和人民的联系，

^①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没有停止自己的构思和创作，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人民哺育着艺术，艺术鼓舞着人民，这一生动景象在这片有着古老文明传统的三湘大地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是分不开的。实践证明，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没有1942年提出的这一方向，就不会有湖南的社会主义文学。文艺为全体人民服务，是毛主席《讲话》所阐释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被所有革命文艺工作者接受，在实践中逐步加深理解并加以丰富和发展。这就初步形成了如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着的文学，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文学。

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发展。“五四”以来的小说，曾塑造了一些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的形象，显示出新文学的特色。现在范围扩大了，除继续塑造农民、知识分子等形象外，还出现了工人、解放军高级干部、少数民族人物等艺术形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劳动人民在小说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他们的形象多是以被侮辱、被损害的身份出现的。随着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已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公。这样，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人形象在作品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人民创造了历史，当代文学创作成功地保证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地位。与此相应，我们这个民族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一百多年来反抗侵略和压迫的革命史、奋斗史。这些历史，过去由于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在文学作品中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只有在社会主义时期，才为充分描写这些历史题材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作家们所表现的题材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弥补了“五四”以后30年间新文学创作的许多空白。如描写工业题材、历史题材、国际题材以及描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材，都先后提到了文学创作的议事日程，并获得了